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壹、研究動機

中、印兩國均位處亞洲，同屬四大文明古國<sup>1</sup>，有著長遠的交往歷史；在 18、19 世紀均曾因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而成為殖民或半殖民國家。因此，中、印兩國人民在文化歷史及國家民族意識上，有著相同的認知背景。1949 年中共建政，印度為最早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之一。1954 年 6 月，中國總理周恩來應邀訪問印度，6 月 28 日中、印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倡導將「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係的準則。<sup>2</sup>這一段時期，可說是中印關係發展的蜜月期。

1959 年西藏發生暴動，印度對達賴喇嘛提供庇護，中印關係出現裂縫，至 1962 年中、印爆發邊界戰爭，雖然為時不長<sup>3</sup>，但自此雙方關係呈現停滯，中印關係進入冰凍期。1976 年兩國恢復互派大使，關係趨於解凍；1988 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 (Rajiv Gandhi) 訪問大陸，1991 年中國總理李鵬回訪印度，官員互訪活動頻仍，中印關係進入回溫期。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格局，呈現的是美國一超下的多極 (uni-multipolar) 局面。<sup>4</sup>中國在對外政策上，除了重視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穩定關係外，也注重協調與俄羅斯、歐洲大國、日本、印度及其他地區大國的關係。<sup>5</sup>同此時間，印度政府亦多方發展與大國的關係，力爭在世界多極化的過程中，使印度從「次重量級」上升為「重量級」，以便有朝一日能躋身「多極」的行列。<sup>6</sup>在雙方領導人均有改善彼此關係意願的基礎上，中、印就阻礙兩國關係發展的根本因素——邊界問題，進行多次對話協商。1996 年 11 月，江澤民訪問印度，兩國就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達成共識。中國

<sup>1</sup> 西方國家將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文明及中國文明，併稱為世界四大文明。2000 年 8 月，日本國營電視台 NHK 為紀念放送 75 週年，同時在東京國立博物館、世田穀美術館、東京都美術館、橫濱美術館，舉辦包括：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兩河流域)、印度文明(印度—恆河)、中國文明的四大文明展。

<sup>2</sup> 耿麗華，「中印關係未來走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 年第 1 期 (2005 年 1 月)，頁 126。

<sup>3</sup> 以 10 月 20 日印度向中國發起進攻算起，至中國於 11 月 22 日宣布停火為止，僅 33 天。

<sup>4</sup>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 (民國 88 年夏季)，頁 29-30。

<sup>5</sup> 蘇浩，「冷戰後中國外交發展的脈絡」，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 (台北：新新聞文化，民國 91 年)，頁 349。

<sup>6</sup> 王良能，*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共的觀點* (台北：唐山，民國 92 年)，頁 4。

總理溫家寶 2005 年 4 月訪問南亞，與印度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簽署『關於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並宣布 2006 年為「中印友好年」，及兩國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6 年 11 月 20 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印度，這是繼 1996 年江澤民訪印之後，相隔整整 10 年，中國最高領導人再次訪問印度。胡錦濤與印度總理辛格發表聯合宣言，雙方指出，將早日為邊界問題的解決商定出一個框架，以便「一攬子解決邊界問題」；此外，雙方也表示將在 2010 年前，使雙邊貿易額從 200 億美元擴大一倍至 400 億美元。<sup>7</sup>顯示中印關係發展已邁向熱絡期。

40 多年前，中、印因邊界問題所爆發的戰爭，對目前的中、印領導人而言，即使仍然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但至少不是迫切的問題。反而是，中、印雙方因自我認知及期許成為大國的企圖，及在地緣政治、全球化經貿發展趨勢下，所形成的競爭關係，才是中、印領導人無可迴避的大問題。近年中、印的經濟崛起，許多學者從戰略或經濟的觀點，對中印關係未來發展提出看法，有認為中、印將因為戰略上的競爭而無可避免成為對手；亦有認為中、印在經濟利益的趨使下，將成為合作夥伴。事實上，認為中、印未來無論是戰略的競爭對手，抑或是經濟的合作夥伴，其中都不免涉及地緣政治因素。中、印兩國在國家發展上，均面臨類似的機遇與挑戰，兩國有合作更有競爭，未來如何發展，對南亞乃至於整個亞洲安全情勢影響深遠，其中地緣政治因素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筆者撰寫本篇研究論文的最主要動機。

## 貳、研究目的：

台灣對於中印關係的研究，相對於中美、中日及中俄（蘇）關係的研究而言，無疑是剛起步的<sup>8</sup>，其原因除了台、印之間的實質交往並不密切外，也在於學術資源的相對缺乏<sup>9</sup>。然而，由於中、印兩國在快速的經濟成長下，政經勢力崛起，西方學者已提出中國將在未來 30 年超越美國，而印度則是在未來 50 年最有可能超過中國的國家類似的觀點。<sup>10</sup>面對兩個同處亞洲且可能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強權國家（且其中之一堅持宣稱擁有台灣主權，不排除以武力維護國家主權），其兩國關係如何發展，同樣位處亞洲的台灣，沒有理由不投注以更多

<sup>7</sup> 大陸新聞中心，「中印『一攬子解決邊界問題』」，聯合報，2006 年 11 月 22 日，版 A13。

<sup>8</sup> 筆者於民國 97 年 1 月 3 日，以「中印關係」為關鍵詞，在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jsp>）查詢，得到結果有 7 筆；以「中美關係」為關鍵詞查詢，得到結果有 52 筆；以「中日關係」為關鍵詞查詢，得到結果有 19 筆；以「中俄（蘇）關係」為關鍵詞查詢，得到結果有 20 筆。

<sup>9</sup>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於民國 94 年 5 月 27 日第 21 次院務會議通過設立「印度研究中心」，由李登科教授擔任中心主任，係全國公私立大學院校當中，唯一以研究印度為主要的研究中心。

<sup>10</sup> 美國經濟戰略研究所所長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預期，中國在 30 年到 35 年裏，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而印度更會後來居上，在 50 年後超過中國。

的重視。筆者希望本篇論文，能對中印關係研究累積些許成果，並為未來研究中印關係學者，發揮「墊腳石」的作用；這是筆者企盼達到的第一個目的。

綜觀中、印兩國關係發展歷程，地緣政治因素可說貫穿前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目前中、印兩國在國家發展過程中，均面臨類似的機遇與挑戰，兩國領導人均體認合作的重要性，但兩國之間的競爭意識，則廣泛存在於安全、經濟及戰略資源等方面。許多學者對中、印兩國，未來究竟屬「競爭對手」抑或「合作夥伴」，頗多爭論；探究中印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藉以分析未來中印關係如何發展；這是筆者企盼能達到的第二個目的。

##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主要在就以往學術界針對研究主題所發表過的作品，予以綜整、分析，藉以支持作者闡明隱含在研究中的邏輯，並滿足讀者的疑問。<sup>11</sup>中國外交學院副教授隨新民曾經在「中印關係研究 50 年：多元化的議程與不對稱的支點」<sup>12</sup>專文中，整理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以後的中印關係研究成果，認為中印關係從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的高峰跌落到 60 年代的谷底，這種僵冷的雙邊關係直到 80 年代末才有所改善。跌宕起伏的中印關係既是雙方政治家思考的現實問題，同時又是國內外學界的關注點。該文整理了 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以來中印關係的研究成果，認為國外學術界對中印關係產生濃厚興趣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和印度之間分歧加深，並最終從邊界糾紛走向邊境戰爭。根據隨新民研究成果，將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依研究內容、價值取向、研究方法以及三者的結合滲透等，歸納中印關係研究分為四類：第一類研究：以邊界問題為主題、以傳統的史學方法為手段、價值取向“一邊倒”的研究；稱之為“傳統研究”。第二類研究：以邊界為主題、以史學方法為手段、但價值取向發生轉向，或客觀中立或更傾向於中方；稱之為“價值修正派”的傳統史學研究。第三類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政治學方法被用於分析中印之間的重大事件，特別是關於印度對華政策的決策分析，這類學者可稱為“後修正派”。第四類研究：關於中印關係史研究，在價值取向上也屬“修正派”，觀點相對客觀。相對於中印邊界爭端及相關研究，這類研究在內容和方法上均不同於以往，而且多屬近年來的研究成果。研究範圍有很大的拓展，如經濟領域，甚至還出現些許中印比較研究方面的成果。

隨新民認為中國學術界關於中印關係的研究，不論是在質（研究方法）、量（學術論著、研究人員）方面，與西方和印度學界對相比，依舊十分薄弱。

<sup>11</sup> 洛克（Lawrence F. Locke）、史皮爾杜梭（Waneen Wyrick Spirduso）、席佛曼（Stephen J. Silverman）著，項靖等譯，**論文計畫與研究方法**（永和市：韋伯文化，2002 年），頁 70。

<sup>12</sup> 隨新民，「中印關係研究 50 年：多元化的議程與不對稱的支點」，**國際論壇**（北京），2005 年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36-44。

原因在於，中印關係在中國對外戰略地位中，長期處於邊緣位置，因此中國學界關於中印關係的研究也是處於非主流地位。但隨著中印雙邊關係改善，中國學界關於中印關係研究也會得到發展。

隨著中、印兩國先後實施經濟改革，成為崛起的大國，西方學者對於中印關係研究也投以較多的關注，惟多著重在中印經濟發展過程的比較，及中印關係發展對區域甚至國際政治、經濟影響的探討。

辛帝克 (James B. Zientek) 在 *China and India: The Struggle for Regional Maritime Supremacy in the Asia-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中國和印度：亞太及印度洋區域海上霸權的競爭) 書中指出：「中國和印度在經濟和政治權力的擴張，讓它們的海軍力量得以進入對方的勢力海域，並進一步保障自己的經濟和國家利益。此種擴張，增加兩國之間彼此的猜疑及緊張關係。」作者也認為這個主張的必要條件是，中、印持續擴張各自的海軍力量，進入到對方宣稱擁有主權的海域，透過各自結盟，在不久的未來，引發對抗與衝突。<sup>13</sup> 作者在書中提出許多中、印各自發展許多海軍現代化計畫，競逐區域安全關係。存在兩國間對抗的戰略思維、歷史上的敵對關係及長期的戰略目標差異等，做為其佐證的依據。此外，對於中、印兩國對於印度洋海域的爭奪，可能引發對抗，也提出了警告。而此一狀態擴散的效應，不僅是在海上主權的爭奪，也將擴散至亞洲大陸的領土，及未來美國的區域安全政策。

法蘭克 (Francine R. Frankel) 和哈丁 (Harry Harding) 主編的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中印關係：美國需要知道什麼) 論集中指出，正當我們進入新的 21 世紀，地球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與印度，仍然持續著彼此糾結的關係。有關邊界的爭議、核武的較量、對亞洲其他國家影響力的競爭、增長的經濟關係以及各自內部的問題，在兩個強權間交互作用，不僅深深影響區域的穩定與繁榮，也影響美國的核心利益；而對中印關係交往的動力，美國僅略知一二。<sup>14</sup> 作者在文中提出三個問題：其一，中、印兩國的戰略思想、國內狀況、國際環境，有何相似相異之處；其二，中印雙邊關係發展的國際因素是什麼；其三，中、印兩國的國家利益，存在那些競爭與緊張情勢。作者認為美國產官學界，對中印關係需要有新思維，並投以更多的關注，因為在未來 10 年，中、印兩國對美國戰略的重要性，將無與倫比。

費德曼 (Edward Friedman)、吉爾利 (Bruce Gilley) 在 *Asia'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亞洲的巨人：中印比較) 著書中，檢視以往對於

<sup>13</sup> James B. Zientek, *China and India: The Struggle for Regional Maritime Supremacy in the Asia-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CA: Storming Media, 2000) .

<sup>14</sup> Francine R. Frankel (Editor), Harry Harding (Editor),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中、印兩國比較，多數認為中國強於印度的看法；以新的範式，從經濟、社會政策、政治及對外政策等方面，重新評定中、印兩國。作者認為以往的看法，是過度的簡單化。<sup>15</sup> 本書相較於其他有關對於中、印兩國實力評定的書籍，其特點是，提供了較多元及內容豐富的中、印對比。

普雷斯托維茨 (Clyde Prestowitz) 在 *全球經濟新霸主：30 億人正在創造經濟強權新勢力* (*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 The Great Shift of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East*) 著作中，提出許多有關經濟方面的數據，質疑中國和印度等國的 30 億人口，其龐大的市場和眾多的廉價勞動力，正將美國的自由經濟逼入困境。美國作為世界頭號發明和技術創新強國的地位終將不保，美元和美國統治世界的力量亦將不再；隨著全球化的成功、深化，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也隨之轉變。昔日神秘、古老的東方國度，藉著接單世界大廠的機會，正逐漸走出貧窮、落後，一躍成為世界經濟舞臺的新星。<sup>16</sup> 本書反映了美國一方面難以抵擋中國市場的誘惑，另一方面卻又恐懼中國崛起的矛盾心情。普雷斯托維茨在書中憂心忡忡認為，面對新崛起的東方 30 億資本大軍（中國、印度、東歐），全世界都輕看不得。

曾萬達 (Wanda S. Tseng)、卡文 (David G. Cowen) 在 *India's and China's Recent Experience with Reform and Growth* (印中最近的改革與成長經驗) 著書中指出，中國和印度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並且以飛快的速度，各自向全球經濟的舞台中心移動。在過去 20 年經濟改革過程中，兩國採取不同的措施，中國採取的是較為外向的策略，而印度至目前為止，仍是採取較內向的策略；中、印兩國能否持續在快速經濟擴張的行列中前進，仍待觀察。<sup>17</sup> 作者在本書中討論了中、印兩國發展與改革的經驗，給予許多正面的評價，也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若干建議。

蔡約瑟 (Joseph C. H. Chai)、羅伊 (Kartik C. Roy) 在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nd India: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改革：競爭願景的發展經驗) 書中指出，印度近幾年高達 6-8% 的經濟成長率，吸引了全球的注意，並思索印度能否追趕中國，成就另一個亞洲經濟奇蹟。作者審視中、印兩個國家在過去 50 年間的發展策略，及目前所採行的改革措施，以一般較易接受的項目，如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等方面，評估兩國的表現，說明為何中國過去表現優於印度，以及印度要超越中國，必需

<sup>15</sup> Edward Friedman (Editor), Bruce Gilley (Editor), *Asia's Giants: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

<sup>16</sup> 普雷斯托維茨 (Clyde Prestowitz) 著，陳俐雯譯，*全球經濟新霸主：30 億人正在創造經濟強權新勢力* (台北：商智，民國 95 年 2 月)。

<sup>17</sup> Wanda S. Tseng (Editor), David G. Cowen (Editor), *India's and China's Recent Experience with Reform and Growth*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面對那些障礙。<sup>18</sup>作者認為，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經驗，有助於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樣是以較為客觀及正面評價中、印兩國的經濟發展。

拉赫曼（Rita Dulci Rahman）、安德魯（Jose Miguel Andreu）在 *China and India: Towards Global Economic Supremacy*（中國和印度：邁向全球經濟霸權）中指出，對於各種有關中國和印度將成為世界強權的爭論，在以往的歷史經驗中，出現兩個國家擁有潛在維持成長能力，足以和美國在政治、經濟上競爭，是未曾有過的。另外，作者在書中描繪中國和印度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發展，作者認為一旦打開內部與外在政治問題的瓶頸，中、印將成為世界強權。<sup>19</sup>

達斯（Dilip Das）在 *China and India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Growth Economies of Asia, 66)*（中國和印度：亞洲成長經濟體的多邊研究）中指出，中、印兩國的經濟是成型的市場經濟。這兩個國家有許多類似之處，同是人口眾多的大國，直到 80 年代時，仍是貧窮的國家；有古老的文明，及經濟發展的優劣勢，然而，兩國在政治體制上有著極大的不同。印度是開放的民主社會，而中國則是由中國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封閉社會，造成了兩個國家在經濟決策過程中的差異。<sup>20</sup>作者在文中有系統的比較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採取客觀不帶偏見的立場，探討具建設性、好的，及不幸、不好的正反兩面看法。

羅蘋（Robyn Meredith）在 *龍與象——中國印度崛起的全球衝擊*（The elephant and the dragon: the rise of India and China and what it means for all of us）乙書中，以描述許多故事的方式，告訴讀者中、印兩國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同時，也改變了世界的命運。作者認為，中、印雖然先後從開發中國家蛻變成超級強國，但印度緩慢而穩定的成長方式，與中國拔地而起形成明顯對比。中、印兩國在許多方面都截然不同，就像毛澤東與甘地殊異；中國專制而印度民主；資本主義的印度經常反商，而共產中國卻親商。中國的實力一眼可見，印度較不明顯。印度的強項在於人力資源能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在迫害資本家的時候，印度的經理人已從征戰國內市場中獲得經驗，因此在商業經營表現上比中國好。中、印兩國的共同點在其轉變，以及改變世界的方式，事實清楚的顯示，中、印已經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經濟大國，兩國在未來幾十年將持續成長，並在下一個世代前主導世界經濟。<sup>21</sup>本書在對中、印兩國經濟發展的評述

<sup>18</sup> Joseph C. H. Chai, Kartik C. Roy,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nd India: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6) .

<sup>19</sup> Rita Dulci Rahman, Jose Miguel Andreu, *China and India: Towards Global Economic Supremacy*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06) .

<sup>20</sup> Dilip Das, *China and India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Growth Economies of Asia, 66)* (UK: Routledge; 1 edition, 2007) .

<sup>21</sup> 羅蘋（Robyn Meredith），藍美貞、高仁君譯，*龍與象——中國印度崛起的全球衝擊*（台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10月）。

上，雖然沒有太多的新意或獨到之處，但在作者不帶主觀意志的書寫方式中，本書對我們瞭解中、印兩國經濟發展的過程，提供另一種較為中立的看法。

1996 年江澤民訪問印度，兩國就建立「面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達成共識；1998 年 5 月印度進行核子試爆；2005 年 4 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南亞，與印度總理辛格簽署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宣言。中印關係發展的曲折過程及未來可能走向，開始吸引各方學者關注的目光。在觀察中印關係未來走向的幾種觀點，大致有：

壹、認為兩國在共同利益驅使下，可以克服彼此問題，成為合作夥伴關係：

張宇燕、張靜春在「亞洲經濟一體化下的中印關係」專文中指，從 80 年代後期開始，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以及中、印經濟改革的深入，為兩國關係的重塑創造了條件，中國和印度已經結束了長期以來相互隔離的歷史。合作對兩國意味著廣泛的收益，包括實現和擴大貿易收益、促進經濟增長、增強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的談判實力、在尋求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過程中避免付出更高代價，以及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周邊安全等。而與此同時，也存在一系列制約兩國深化合作的因素，諸如各自國內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地緣政治和兩國經濟上的競爭、外部力量的牽制等。<sup>22</sup>張宇燕、張靜春認為中印關係的發展存在三種可能性：第一種，不建立合作。這意味著中、印之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零和的競爭關係，而且強大的中、印之間必有一拼。從現實來看，這種回到從前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第二種，實現較高程度的貿易自由化和在國際舞臺上形成全面戰略同盟。事實上兩國已經組成了政府間的聯合工作組，討論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不過現實中存在的促進和制約合作的因素顯示，在短時期內建立起這種關係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三種可能性是，中、印合作將循著穩步、低速的方向持續推進，兩國將進一步深化貿易聯繫和探索可以合作的領域，但是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大致保持在“好鄰居”的範圍內。

衛靈在「中印安全戰略及中印安全關係」專文中，認為中、印之間可以尋找到許多共同點，但分歧也是明顯的，特別是邊界問題，是兩國半個世紀以來恩恩怨怨的焦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化解肯定是有難度的，預計徹底解決兩國邊界問題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從目前中印關係的發展分析，邊界問題應當不會成為雙邊關係全面發展的障礙，因為 55 年的歷史告訴兩國的是，合則兩利，鬥則兩傷，和平友好、對話協商應當成為 21 世紀兩國關係的主旋律，它不僅符合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也符合中、印兩國的安全戰略和發展目

<sup>22</sup> 張宇燕、張靜春，「亞洲經濟一體化下的中印關係」，當代亞太（北京），2006 年第 2 期（2006 年 2 月），頁 3-17。

標。<sup>23</sup>

藍建學在「後冷戰時期的中印關係：正常化與戰略和諧」專文中認為，中、印戰略之間的關係形態往“動態的咬合”方向發展更有前途，而不應追求“靜態的和諧”。在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各國都力求本國相對利益的最大化，中、印兩國的根本戰略的完全和諧是一種很難達到的理想狀態。中國與印度就像亞洲機器系統中的兩個飛速運轉的齒輪，輪齒與輪齒在接觸的過程中儘管可能會摩擦出“不和諧”的火花，但卻造就了穩固的、動態的相互咬合狀態，同時也推動亞洲機器的運轉；而且，隨著輪齒上的棱角被磨平，加上潤滑劑的使用，齒輪之間的咬合將獲得常態化和穩定化。<sup>24</sup>

印度戰略專家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Asian Juggernaut: The Rise of China, India and Japan*（勢不可擋的亞洲大國—中印日的崛起）著書中，對三個亞洲大國詳細比較分析。中國：自從日本在明治時期崛起為世界一流強國以來，還沒有那一個非西方國家能像當今崛起的中國這樣，對世界秩序產生舉足輕重的潛在作用；印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受到世界一流服務業支持的印度經濟體正經歷快速改革，過去幾年的經濟成長率超過 8%，還擁有 5 億多的年輕勞動力；日本：隨著要求修改和平憲法的國內壓力愈來愈大，日本作為正常國家重返世界舞台，在塑造新亞洲格局上擁有決定權的日子也即將來臨。<sup>25</sup> 布拉馬·切拉尼認為，這三個亞洲大國可以通過建立強調互利的政治關係，從而為亞洲其他國家提供一個典範。

張宇燕等人，主張中印合作論者，多從經濟利益觀點出發，認為中、印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勢必走向合作一途。雖然目前中、印兩國貿易往來確實有所增長，但欲成為中、印兩國關係發展的基礎，則仍有其不足。渠等刻意忽視中、印邊界問題遲遲未能解決的事實，以主觀的期待超越客觀的評估，其論點，尚不足以作為中印未來關係發展的評斷。

貳、認為兩國因邊界問題及地區霸權競爭心態，中、印將成為競爭對手：

王良能在**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共的觀點**著作中認為，冷戰後國際局勢雖然有很大變化，但影響中、印兩國的因素卻沒有太大的變化。中國與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不丹等南亞國家交往，常常引發印度的妒恨，原因是印度自視為南亞霸權，不希望中國介入南亞事務。印度是否會改變對中國的戒心

<sup>23</sup> 衛靈，「中印安全戰略及中印安全關係」，*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北京），2005 年第 6 期，頁 93-99。

<sup>24</sup> 藍建學，「後冷戰時期的中印關係：正常化與戰略和諧」，*南亞研究*（北京），2005 年第 2 期，頁 8-14。

<sup>25</sup> Brahma Chellaney, *Asian Juggernaut: The Rise of China, India and Japan* (India: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6) .

仍待觀察。印度和中國在經濟、貿易、科技、文化方面的關係不斷擴大，但中、印之間仍存在一些問題，未來中、印雙方在國際上的合作可能有所加強，但在軍事領域及邊界局勢上可能仍維持「冷和」局面。<sup>26</sup>王良能對於中印關係在進入 21 世紀後，是否能有較大幅度的進展，明顯持較為保留的態度。

王良能等學者，認為中、印之間既存在著邊界問題的爭議，同時也面臨著在南亞爭霸的權力競逐矛盾，很難進行「真正」的合作。惟渠等對中、印積極進行的邊界談判，及透過持續軍事交流建立軍事互信的努力，並未給予正面的評價，因此，中印對手論，亦不足以作為中印關係未來發展的論斷。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 壹、研究範圍

研究問題的明確與否，取決於涵蓋範圍的具體與正確態度。<sup>27</sup>本文探討中印關係的時間範圍，以 1950 年中共建政始，至 2007 年「中印旅遊年」。其中有關於中印邊界爭議，則涉及在 18 世紀中葉，印度淪為英屬殖民地，及英國於 1913 年 10 月 13 日策劃中、英、藏三方參加的西姆拉會議。筆者以冷戰期間及冷戰後作為兩個階段，分別探討影響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因素，再以地緣政治觀點，就中印關係發展中的有利因素及制約因素，探討中印關係未來可能發展趨向。

#### 貳、研究限制

研究計畫中的限制是指具限制性的條件或缺點。此乃基於無法在研究設計中控制所有的因素，或者因為研究倫理或可行性的問題，而無法從事最理想次數的觀察。<sup>28</sup>有關中、印兩國關係研究，國內學者所著專書、論文並不多，如以國內較容易獲得的中國相關文獻、書籍，或西方媒體轉載印度學者所持觀點，據以論斷幾個影響中印關係發展的重大事件，則容易因其民族立場而失之客觀，此為本文限制之一。

本文探討中印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除了中、印兩國本身獨特的交往過程之外，還須從冷戰期間美、蘇對抗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及冷戰結束後的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觀察地緣政治在中印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時間範圍前後超過 50 年，在資料蒐集、研整及論點支撐上，難免有其不足之處，此為

<sup>26</sup> 王良能，*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共的觀點*（台北：唐山，民國 92 年）。

<sup>27</sup> 洛克（Lawrence F. Locke）、史皮爾杜梭（Waneen Wyrick Spirduso）、席佛曼（Stephen J. Silverman），項靖等譯，*論文計畫與研究方法*（永和市：韋伯文化，2002 年），頁 12。

<sup>28</sup> 洛克（Lawrence F. Locke）、史皮爾杜梭（Waneen Wyrick Spirduso）、席佛曼（Stephen J. Silverman），項靖等譯，*論文計畫與研究方法*（永和市：韋伯文化，2002 年），頁 16。

限制之二。

對於上述缺憾，希望能透過近代西方第三者以較客觀立場所著之專書、論文，以平衡對中印關係發展的論述，同時在本文陳述上，儘量避免摻雜個人好惡情緒；另從大量、即時的文獻資料交互比對，強化本文的完整性，以提高本研究的可信度。

####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途徑

##### 壹、研究方法

國際形勢與歷史事件是國際關係的現象，國際關係理論是對這些現象後面的規律做出的解釋，而研究方法則是獲得這些理論解釋的手段。<sup>29</sup>因此可以把研究方法視為一種研究現象和創造理論的手段、門路和程序；也可以把研究方法簡化視為一種「工具」。本文將以文獻分析法做為全文的主要研究方法。藉由蒐集國內、外書籍、期刊、論文、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等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比較、整理與綜合，並且從理論與實務等構面，分析中印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

##### 貳、研究途徑

「地緣政治」作為一種研究途徑，主要是解釋地理環境因素對於國家在國際政治行為方面產生的影響。<sup>30</sup>知名的國際政治與戰略學者柯林·葛雷（Colin S. Gray）則認為，地緣政治是：「國際政治權力對地理背景的關係。」柯林·葛雷主張地緣政治的優點是，當你不濫用時，它的確能指導注意於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因素。<sup>31</sup>本文採用柯林·葛雷對於地緣政治的定義，並據以作為本文的研究途徑。

中國地緣政治學者陸俊元依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以及研究者不同的思維及分析方法，所產生不同的地緣政治理論，將之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sup>32</sup>

一、地緣政治理論形成的早期，以拉采爾（Ratzel）、克哲倫（Kjellen）、郝斯霍佛（Haushofer）為代表的德國地緣政治學。其基本特徵有：（一）以國家

<sup>29</sup> 秦亞青、閻學通、張文木、時殷宏、馮紹雷，「國際關係研究方法論筆談」，*中國社會科學*（北京），總第145期（2004年1月），頁82-83。

<sup>30</sup> 中華歐亞基金會編，《地緣政治與中共外交戰略》（台北：大屯出版社，民國95年6月），頁1。

<sup>31</sup> Colin S. Gray 著，王正己譯，*核子時代的地緣政治*（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4年），頁5-6。

<sup>32</sup>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年），頁53-56。

為研究尺度，在國家層面研究政治與地理的關係；（二）把地理環境看作影響國家政治的要素，強調地理要素對國家發展的限制作用；（三）研究方法上，模仿或借用自然科學成果，試圖用自然規律解釋社會現象。

二、以馬漢（Manhan, Alfred Thayer）、麥金德（Mackinder, Sir Halford, John）、斯派克曼（N.J.Spykman）等為代表的理論。主要強調某些空間對權力的決定性作用，其基本特徵有：（一）研究空間尺度超越了國家，發展到世界性或全球性，觸及大區域，甚至全球性的政治關係；（二）以空間與權力的關係為核心內容，強調控制空間的意義，崇尚控制地理空間對贏得世界霸權的價值；（三）側重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綜合地運用歷史學、社會學、軍事學、製圖學、地理學等方法，分析政治現象和國際關係。

三、以 20 世紀 60 年代後出現的科恩（Sall B. Cohen）、華勒斯坦（Wallerstein）、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等為代表。這類理論是以地理學的區域觀念為指導，用地域結構分析方法，考察整體世界中包含的政治地域結構以及不同政治區域間的相互關係，其基本特徵是：以全球性的整體視野，觀察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地緣政治關係，在具體方法上，則都注意運用政治學、地理學等領域新的研究成果，並有所創新。

中國地緣戰略學者樓耀亮，則將地緣政治理論依其提出時期劃分為三個時期：<sup>33</sup>

一、早期地緣政治理論：產生於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以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為代表；首先提出“地緣政治”的概念，並從此一視角對國家興亡、朝代盛衰提出自己的觀察與解釋。

二、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產生於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 40 年代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時期；以海權論、陸權論、空權論及邊緣地帶論等學說為代表；這些學說主張通過控制世界上實力分布的關鍵地區，來達到稱霸世界的目的，雖然是在為其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所服務，但與早期地緣政治理論相較，其觀察視角更為開闊，能以全球的高度，用地理透視的方法來分析世界各戰略力量消長變化的原因，及發展前景。

三、現代地緣政治理論：於二戰之後開始發展；以科恩的“分裂世界”的地緣政治模式、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以及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地緣戰略思想”為代表；以更新的、多元的角度來審視世界這個大棋盤，透過對各種國際力量的地理分析，為本國在國際鬥爭中維護國家安全、謀求有利的戰略態勢出謀劃策。

<sup>33</sup>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頁 6-9。

台灣學者唐仁俊、李明正，則依不同時期的國際格局，將地緣政治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sup>34</sup>

一、二次大戰前：此為第一階段，始於 19 世紀末，終於 1945 年；當時世界地緣戰略格局的特徵是以歐洲為絕對中心；以拉采爾的國家有機體論、馬漢的海權論、麥金德的陸權論、杜黑的空權論、德國郝斯霍佛為代表的德國地緣政治學派及斯派克曼的邊緣地帶論等，最具代表性。

二、冷戰時期：為第二階段，始於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終於 1991 年蘇聯瓦解。此一階段的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特徵，是以美、蘇對抗之兩極化冷戰格局為核心；以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及格雷厄姆（Graham）將軍的高邊疆戰略論，為此階段的代表。

三、冷戰後時期：第三階段，始於 1991 年蘇聯瓦解迄今，其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特徵是一超多強，並以經濟議題為核心。以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盤論、杜爾曼（Everett C. Dolman）的太空地緣政治論，為其代表。

目前學者對「地緣政治」的意義，存在著兩種認知，一是把它界定為從地理視角分析世界政治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研究成果，也就是一個理論；二是把它作為一個複和概念來解釋，既包括方法論含義，又理解為以地理為基礎的現實政治。<sup>35</sup>針對本論文的研究，期能回溯歷史的進程，整理出中共建政後，中印關係從友好蜜月期到戰爭冰凍期，再解凍、回溫而進入熱絡期，雙方的戰略思維轉折，及其考慮的地緣政治因素。另採用學者柯林·葛雷對地緣政治是「國際政治權力對地理背景的關係」的觀點，就當前「中印競爭」、「中印合作」及「中印競合」等論點進行論證，對中印關係未來發展趨向，提出較為具體的觀察與瞭解。

## 第五節 論文架構

由於本論文主要研究中印關係中的地緣政治因素，因此，如何說明及界定地緣政治的概念，並掌握地緣政治對中印雙邊關係發展的重大影響，予以簡明、清晰、完整的客觀陳述，至屬關鍵。本論文嘗試以冷戰期間及冷戰後作為兩個階段，分別探討影響中印關係的地緣政治因素，並就學者所提出對中印關係未來發展的看法，歸納為「對手論」、「合作論」及「競合論」等三種觀點，分別加以評析，進而論述中印關係未來可能發展趨向。研究架構內容摘要如後：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研究

<sup>34</sup> 翁明賢、吳建德、江春琦總主編，**國際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6年8月），頁155-170。

<sup>35</sup> 陸俊元，**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年），頁64。

方法及論文架構；第二章概述地緣政治的緣起及其發展，並以其發展歷史為區分，分別探討傳統、現代地緣政治理論；第三章是以 1950 年代至冷戰結束前為時間範圍，探討冷戰期間影響中印關係發展的地緣政治因素；第四章是分析冷戰後世界地緣政治的發展，及受到現代地緣政治思維影響下的中、印兩國新安全思維，進而探討冷戰結束後影響中印關係發展的地緣政治因素；第五章是將目前學者對中印關係的觀點，歸納為對手論、合作論及競合論，分別透過現代地緣政治思維，結合中國學者提出的地緣戰略論、油緣政治論等觀點，分析此三種論述的支持條件及制約因素，進而探討中印關係未來的可能發展趨向；第六章為結論。

